

雪天

張麟著





雪

天

張 麟 著



新 文 艺 出 版 社

• 1958 •

內 容 提 要

这是一个以軍事斗争和部队生活为题材的短篇集。“雪天”、“將軍的故事”、“深山密林”三篇，都是写东北抗日联軍的斗争故事的。作品里描绘了坚持在深山密林里和敌人作艰苦斗争的英雄們的高貴品質和他們动人的形象。“旅伴”描写的是一位做軍事測繪工作軍官的爱情生活，和他艰苦的工作。“上尉和他的妻子”描写一个軍官原来打算把妻子从家乡接到部队里，但在家乡看到农业社里紧张的生产情形，他放弃了自己的打算，讓妻子留在社里，以实际行动支援农业生产。“常青树下”很生动地塑造了一个热爱部队、热爱工作的班长的形象。

雪 天

張 麟 著

*

新 文 艺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155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业營業許可証出011号

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 新华書店上海发行所总經售

*

書号 1669

开本 787×1092 耗 1/32 印张 2 3/4 字数 49,000

1958年5月第1版

1958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7,000 定价 (6) 0.24 元

統一書號：10078·1669

定價：0.24 元

目 次

雪 天	1
將軍的故事	17
深山密林	28
旅 伴	45
上尉和他的妻子	54
常青树下	72

雪 天

下雪了。我坐在火爐旁边，望着窗外紛紛飞舞的雪花，不由得又想起我的林生——我亲爱的儿子。他要是活着，今年該是二十六岁了。

这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事。我的林生，是在冰天雪地的大森林里誕生的。

那是一九三二年的冬天——“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年。我和我的丈夫，接受了党的指示，到牡丹江下游巴彥地区去組織抗日救国会。一天晚上，也是下着这样大的雪，我們穿过一片大森林，准备到山区去。因为我怀着八个多月的身孕，走得很慢。正走着，我突然感到一陣肚疼。我的丈夫說我受了凉，随手掏出一小块大烟（这是隨身携帶的藥品）放到我的嘴里。可是我吃下它，肚子仍是疼。和我們一块走的还有老洪，他是个农民出身的抗日救国会會員。他是三个孩子的爸爸，人还不滿四十岁，就留下了兩撇仁丹胡。他在我們夫妻面前，象个老爸爸。听說我吃了大烟，急得直跺脚，对我丈夫埋怨着：“她是怀了孩子的人，怎么好吃这种东西呢？会早产的……”

那时我只有二十一岁，我的丈夫也不过二十五岁。我

們結婚才兩年，都不懂生孩子的事。一聽老洪的話，我們都呆住了。天啊，在這個大森林里，冰雪鋪地，前不見屯，後不見村，多可怕呀！

我的丈夫在哈爾濱做地下工作的时候，向來是沉着的，情況再緊急，我也從沒見他慌張過，他總是愛哼哼幾首歌。可是現在他也慌張起來了。他張着雙手，象求救似的向老洪說：“你看怎麼辦，怎麼辦啊！”

老洪蹲在我旁邊，沉思了半天，才慢吞吞地站起來，向我丈夫說：“在這裡呆着更不是辦法，還是往前走吧！”

他們倆攙着我，在蒼茫無邊的大森林里繼續前行。風，吹着枝梢吱吱响；雪，直往我穿的那雙大靴襪里灌。我咬着牙，雙腿不由自主地挪動，又走了幾里地，天漸漸黑下來了。我渾身虛汗，肚子劇痛，快要暈過去了。他們倆只好讓我靠着一棵大樹坐下來歇歇。老洪向四外瞅了一會，突然高興地叫道：“火亮，有火亮！”我的丈夫隨他指的方向望去，也高興地說：“謝天謝地，看見屯子了！”

他們又把我扶了起來，再往前走。眼前有了希望，痛苦象是減輕了許多似的，可是我還是被半推半抬着挪動脚步。

走過一棵樹，又走過一棵樹，不知走過了多少棵樹，总算拖到了火亮的地方。

這哪里是屯子？原來是一個木头搭的孤独的小窩棚。窩棚的門，是樹枝編的。我們掀開門進去，看見火堆旁邊坐着兩個老头，正在烤苞米窩窩吃。我迷糊地看到他們身旁

靠着獵槍，槍上挂着幾只兔子。一看就知道是獵人。他們鬧不清我們是什麼人，吓得兩眼直轉。老洪拍拍一個老獵人說：“別怕，我們是抗日救國會的。有個同志病了，想借你們這裡住一住。”他們听了，才放下心。一個老獵人很客氣地說：“這獵棚是大伙的，你們不嫌乎，就住下吧。”

我丈夫向一個老獵人問道：

“這裡離屯子多遠？”

“喲！說近的也有二十里。”這個老獵人回答說，同時拿小樹枝撥弄火里的苞米窩窩。

窩棚小得可憐，當中架上一堆火，四周蹲不下五個人。兩個老头看看住不開，吃了窩窩頭，拿起獵槍就走了。他們留下的那堆火，木頭就要燒完了。老洪把隨身帶的一條粗布被子解開鋪在火旁，忙着搞燒柴。

我丈夫解下背包上吊着的一只白茶缸子，到外邊裝了一缸子雪，放在火旁邊烤着。

不多一會，老洪抱着一些松樹枝回來。他折了幾節樹枝放在火堆上，向我說：“這就不要緊了，這就不要緊了。”

樹枝慢慢地燃燒着，噼噼拍拍亂炸。烤在火旁的那茶缸子雪已經化成了半缸子水，吱吱呀呀響起來。我突然感到要死在這堆火旁邊似的，不由得流出了淚。我那時剛入黨不久，才懂得了人生的意義，多麼想活着啊！可是一個小小的生命，要毀掉我的一切。我恨這個還沒出世的小東西。

我丈夫望着火苗，默不作聲。

老洪往火上添着樹枝，慢條斯理地安慰我說：“女人生

小孩，不是什么可怕的事。我那第三个孩子咬儿，是他娘在包谷地里生下的。当时她一个人正掰棒子，就生了。孩子落在装包谷的麻袋上。……”

听了他的话，心里安静了些。可是，再想想：他女人是生过两个孩子的母亲，我怎能跟她比？……

我在火旁边翻滚了一宿，天快亮的时候，孩子落地了。我从昏迷中醒来，没听见有哭声。眼睛睁开看看，我丈夫正用一块黑布把孩子小心地包起来，我问：

“小东西还活着吗？”

“活着，活着。”他的声音很激动。“你看，是个男孩子。”

他把孩子轻轻地放在我身旁。我看见孩子身上裹着一层黑棉垫子，问他是哪里来的。他没有回答。当我看见老洪的长袍变成了小襖，这才明白过来。可怜的孩子，连块包布也没有，要不是老洪撕了袍子，真要赤裸裸地光着。我把脸转到一边，偷偷地擦去了眼泪。

借着松枝燃烧的亮光，我看见孩子发皱得难看的小脸。我心里暗暗在说：“我可怜的小生命啊！你怎么选择了这个时候来到人间！”

我丈夫和老洪商量着下一步的事。他们说要先到附近找个屯子，把我和孩子送去。我心里想：这孩子不足月，又是生在这个地方，是养不活的，不如早一些丢掉算了。可是，这话总说不上口。鼓了好半天，我才说：“别费心了，把他丢

掉，我們一塊走吧！”

我丈夫沒說話。老洪用眼瞪着我，責備地向我說：“你這是什麼話！我們打游擊，打鬼子，為的什麼？還不是為孩子們！”他把眼光收回去停在孩子臉上，又繼續說：“我們能找個地方把這孩子養大成人，他就是一顆革命的種子啊！”

林子里的小鳥噉噉噉噉亂叫，把黑夜吵走了。老洪把化了的一茶缸雪水喝下去，對我丈夫交代了幾句話，就走了。

我丈夫又出去裝了一茶缸子雪，放在火上烤着。他坐在我旁邊一句話不說，一會看看孩子，一會望望我。我看見他的臉色蒼白，兩眼發紅。可是他那紅腫的兩眼，有一種我從來沒見過的光芒。這是快樂的光芒。也許，人們頭一次做爸爸都是這樣，我說不出。

天快黑的時候，老洪回來了。他領來了兩個老鄉。手里提着一只黑磁罐。磁罐里盛的是煮好的包米湯。他把湯放在火上暖着，取開一個手巾包，拿出兩塊包米干糧給我丈夫，然後又從衣兜里摸出五個煮熟的雞蛋，在小黑磁罐上碰破，扒去皮放在包米湯里。然後向我說：“你不能吃涼的，等蛋熱了再吃。吃下去咱們就走，我已經找好地方了。”他說着招了兩節小樹枝給我當筷子。

我望着老洪那兩撇仁丹胡子，覺得他完全是我慈愛的父親，我從心里感激他，不由得又流下了淚。但是，我的淚沒讓他看見就擦去了。

晚上，兩個老鄉用一塊門板做的担架，把我和我的兒子

抬到了孙家屯。

这个屯子，只有二十多户人家，大多是靠打猎为生。我住在一个姓王的寡妇家里。这时候孩子睁开了小眼，张着小嘴哇哇地哭。房东大嫂给他灌了一洒盅暖开水，他不哭了，又闭着小眼睡去。桌上一盏昏暗的松明子灯，照亮着孩子的小脸，我这才看见他脸上有一层细细的黄毛。样子是十分难看的，可是我对他却有很大的好感。现在我唯一的希望：孩子能健康地活着。象老洪说的那样，让他成为一颗革命的种子！

我丈夫轻着脚步走进来。他的脸贴住我的脸，快活地说：“老洪给孩子起了名，叫他林生，你说好吗？”

这是多么好的名字啊！我抱起孩子，轻轻地吻着他的小脸，低低地叫了一声：“我的小东西——小林生啊！”

这时候我们正扩充队伍，我丈夫不能久陪着我，隔天晚上，他跟老洪走了。

孩子的小脸一天比一天好看起来。他额头上的皱纹浅了，头发黑了，小眼亮了。吃饱了，就象一只小猫，安静地蜷在我身旁。我感到了做母亲的幸福，我是多么不舍得离开孩子啊！

在孩子满月后的第六天晚上，我的丈夫和老洪来了。他抱起孩子没轻没重地亲着，他那被风吹粗了的脸，把孩子擦醒了。直到孩子张着小嘴哭起来，他才把孩子交给我。然后在我身旁坐下，兴致勃勃地向我说：我们的游击队扩大得很

快，現在有一百多人了。哈爾濱來了一批青年學生，還有五個女的。……

我听了真高兴。我向他說：“我不能光住在这里喂孩子，要回队伍。”

他答应了。

第二天，我們把孩子送到了洪家屯老洪家里。老洪远房的侄儿媳妇有个孩子死了，她还有奶，經老洪家里說情，我們把林生交給她奶，还答应每月貼些錢給她。事情办妥晚上我們就走了。

在战争的年月里，尽管人們都感到过一天比一个月还長，可是我們并不覺得那样。白天，夜晚，风里，雨里，我們四处奔走，不知不觉，过去了五个年头。到了一九三七年，我們的游击队发展到了一千多人，我丈夫做了抗日联军一个团的团长。我做了团后勤的政委。老洪和我一块工作，他是后勤被服厂的厂长。

在这五年間，我們时常去看望自己的孩子。林生已經長大了。养他那家人因为又添了孩子，早把他送到了老洪家里。部队打了胜仗，繳获了战利品，象餅干、罐頭、糖果，我們就給孩子送点去。我还記得，有一次，我們打了敌人五輛汽車，繳获了很多吃的东西。一天晚上，下着大雨，我去看我們的林生。孩子很頑皮，他不認我是他的媽媽。老洪家里把他推到我跟前，对他說：“林生，好乖乖，叫一声媽媽。”孩子把头一扭跑了。跑到房門外，回头望着我。一时我忍受不

住，流泪了。

老洪家里是个厚道的女人。她见我流泪，叹了口气：“唉，小鼻子（指日寇）把我们害得妻离子散，亲生的儿子不认娘。”说着她也流下了眼泪。

我不好再使她难受，擦干眼泪安慰她。她是个好心肠的女人，扯着袖子擦了泪，反过来又安慰我说：“秦同志，孩子是娘身上的肉，离开了总是想。你在外边只管放心，你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在这里我亏待不了他。你们早一天把小鼻子撵走，咱们就好了。”

我每次看望孩子回来，都感到身上增加了一股摸不到看不出的力量。

就在这一年的秋天，日寇进行了一次大“扫荡”。一天，听说洪家屯遭受了敌人的“扫荡”，我和我丈夫都十分着急，老洪当然更着急。可是，我们俩都脱不开身，只好派老洪带着几个“便衣”连夜赶回去打听一下情况。

老洪很喜欢我们的林生。这几年，他时常向我们提出：要林生认他做干爸爸。我丈夫总是笑着回答他说：“革命部队里，同志之间比什么都亲，不必再加上个干亲。”老洪摸着他的仁丹胡，乐哈哈地说：“革命同志，再加上亲戚，那不更亲吗！”

说到这里，我们都要大笑一阵。不过，我常想：应该让孩子叫老洪干爸爸。为了这个孩子，老洪不比我们费心少啊！

第二天晚上，老洪回来了。完全出乎我们的意外，他把林生带来了。我们正开会研究工作，一见孩子，开会的事也

忘了，只顧忙着親熱孩子。孩子這時候有小馬槍高了，頭上留着馬兒蓋，吃得很胖，兩個圓溜溜的腮幫發光。

突然，我看見老洪的臉色很難看，他象呆了一樣站在旁邊。我急着問他：“你怎麼了？”他兩眼含着淚，一隻手捂着自已的額頭，痛苦地說：“屯子被鬼子燒了，她們沒跑出來……”

我听了，如同冷水劈頭澆下來。我的丈夫也怔住了。

原來，老洪家里聽說鬼子進了屯子，她估摸着敵人這一來不會善了，又耽心着林生被敵人知道，暗地里差鄰居的一個老太太把林生帶出去，可是，她和三個孩子沒跑脫，被敵人放火燒死在屋子裡。老洪趕回去，屯子變成了一片焦土。他連老婆孩子的屍體也沒找到。後來碰上村里一個人，他才找到了林生。……

我們听了，心里象刀扎。我想起老洪家里——這個善良的女人，她救活了我們的林生，可是，她和孩子却死在敵人手里。這是永遠難忘的仇恨！

這一年，日寇在東北廣大地區實行殘酷的燒殺并屯政策。他們放火燒掉了山區的無數小屯子。屯子裡的老百姓除了燒死的，剩下的都被趕到幾個大屯子裡去了。敵人在這些大屯子裡安上據點，屯子外用木棒拉上圍牆，圍門外放上崗。屯子裡實行着“連環保”。日寇頒發了一條法令：“一戶通匪（指抗日聯軍），十戶滅門”。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的活動更加困難了。原來建立的一

些关系，有的断绝了，剩下的一些关系，只能秘密和我们联系。我们再想找个屯子把孩子寄下，是困难了。没有办法，我们只好把五岁的孩子留在游击队里。

我们的活动，也由山村转到了森林。住的是帐篷，睡的是枯草，我们的生活，正象一只歌所唱的那样：“天大的房子，地大的炕；火是生命，森林是我们的家乡，野菜是我们的食粮。”

生活已经够苦的了，我再带上一个五岁的孩子，更是苦上加苦。林子里到处是野兽，驻军的时候，我也不敢把孩子单独留在帐篷里，走一步，带一步。

孩子给我们带来了许多麻烦，但是，也给了我们快乐。他是我们生命中的花朵。行军，他走在我前头，甩着两只小手，登登地直跑。走上几里累了，他跑不动了，同志们象背粮袋似的，轮换着背他。每到了新的宿营地，我们都累得都不想动了，孩子却象林里的一头小鹿，这里跑，那里跑。同志们看见他，累的也不累了，逗着他玩，教给他唱歌。我和我丈夫时常听见战士们和孩子的对话：

“林生，你长大了做什么？”

“打日本呀！”

“你知道怎么打啊？”

“我拿爸爸的小枪，就这样：彭！小日本就完蛋了。”

我记得，有一次我和我丈夫听了这些对话，相互望着笑了。我说：“难道我们这一代人还不能把鬼子打出去。还要孩子打吗？”他说：“不，不会的。等孩子能当兵扛枪的时候。”

革命早就成功了。那时候說不定住大楼呢！”

老洪工作很忙，但是，只要他有一点空，就把林生摟在自己怀里，他那毛茸茸的下巴，放在孩子的肩膀上。我們知道，現在他唯一的亲人，就是林生了。部队虽然很艰苦，三天兩頓是吃野菜加苞米蒸的餅子，可是，老洪总是想尽办法給孩子弄点米面吃。

我們的林生跟我們过了兩年多的森林生活，他那嫩白的小臉，变成了紫紅色。慢慢地，孩子懂事多了，三十里二十里的行軍，他再不要人背了。有一天准备行軍，孩子居然向我說：“媽媽，我帮你背东西吧。”我說：“好的，孩子。”我就把我們的一只白洋磁盆用小繩拴好，給他背在身上，活象背着个小鼓。

一九四〇年，形势更加惡化了，敌人調集了大兵团“圍剿”我們，我們的部队編成几支小部队，分散地住在深山密林里坚持斗争。冬天，下了兩場大雪，落叶松树都变成了秃頂子，冷到了零下十多度，我們还没穿上棉衣。我丈夫看孩子冻得不行，把身上穿的一件繳获来的旧呢子大衣撕了替孩子改了件小大衣，剩下的料子，他自己縫了件背心。

一天晚上，我和孩子正在帳篷里烤火，我丈夫穿着一身單进来了。他把孩子摟在怀里，亲亲热热地問道：“林生，冷嗎？”

“不冷呀，爸爸。你摸摸我的手，还热着呢！”孩子把自己的小手捂在他爸爸臉上。

在这种情况下，我丈夫仍然是很乐观的。他没有事，爱

和我开玩笑。談到棉衣，他笑着对我說：“我們的后勤政委同志，你不想想办法，能老叫我們过夏天啊！”

这虽然是夫妻之間說的笑話，可是，我心里挺难受。有什么办法呢，敌人对我們封鎖得那么紧，多次找关系搞布和棉花，牺牲了人，东西也沒搞到手。

他見我把話当了真，又反过来安慰我說：“不要发愁，战士们挨冻也不会怨你。”他突然眼睛一亮，高兴地、低声对我說：“我們准备打个仗，主要的目的是解决棉衣。”他說着，拿着孩子的兩只小手，一边拍打，一边教孩子唱着：

沒有吃，沒有穿，
自有那敌人送上前。
沒有枪，沒有炮，
敌人給我們造。
我們生長在这里，
每一寸土地都是我們自己的，
.....

看，他倒象个孩子，說唱就唱起来了。

几天之后，我們团打开了一个小县城。搞到了三百多匹白布，好几百斤棉花。另外，还搞了三部縫紉机。这是多么开心的事啊！痛心的是：老洪在这次战斗中牺牲了。我从来沒見我丈夫流过泪，可是自此以后，一提到老洪，他每次都是含着泪不說話。